

## 绪 论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东接黔桂，北靠川藏，西部、南部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毗邻，自古为我国通往南亚并越海远去欧非两洲必经之地，因其物产丰富而有“动物王国”、“植物王国”、“有色金属王国”的誉称，云南民族风情多姿多彩，名胜古迹星罗棋布，旅游资源极为丰饶，难以位处高原，地形复杂、山壑纵横、重峦迭嶂、江流急湍，交通条件甚为艰难。

历代执政者中具有远见卓识的少数杰出人物为改善交通，发展经济，帷幄运筹，爱国爱乡的有识之士献策筹款，奔走呼吁，各族劳动人民世代相袭，前仆后继，顽强奋战，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冲破崇山峻岭和大江激流的阻障，开辟出了连结全滇要镇、沟通川藏黔桂、通往缅印越老的步道驿道，被史学界称为“蜀身毒道”或“南方丝绸之路”。而千百年来人们在这条漫长而崎岖的故道上，以人背、牛马驮运的原始方式从事着艰难的运输活动，有的甚至是长年累月的跨省跨国的长途大宗货运。本书主体部分的编前篇中，勾画了古代云南步驿道运输的概况。

近代交通设施——铁路与邮电于清朝末年在云南出现，公路运输则迟至本世纪 30 年代才在云南兴起，迄今仅半个多世纪。1925 年云南境内始有汽车，是地方政府从越南购买 4 辆，用火车从滇越铁路运进昆明的。其后私营汽车行业艰难地兴办起来，发展缓慢，时起时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半壁河山陷入日本侵略者铁蹄之下，国民党中央政府迁都重庆，云南战略地位甚为重要。滇越铁路拆轨，1938 年赶修通车的滇缅公路便成为中国南方唯一国际

通道，因而云南汽车运输作用特别突出，呈现畸型繁荣的局面。中外军用与民用汽车大量行驶于滇缅之间，高峰时每昼夜达 5000 余辆。汽车运输与中印空运、中印油管运输、西南驿运开展大规模接转运输，对中美英盟军中缅印战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因此，滇缅公路与后来的中印公路及其运输活动，举世瞩目流芳史册。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云南战略地位随之改变。在短暂的复员运输繁忙景象之后，因战时迁滇的工厂、机关、学校及交通设施大批离滇东迁继之国民党发动反共内战云南公路运输迅速衰落。至 1949 年全省汽车仅有 1626 辆其中客车只有寥寥 20 辆。战时由国民党中央政府与云南地方政府先后统管的云南驿运，战后宣告停办，民间驿运也因经济衰退而未能振兴。

民国时期云南公路运输经历了初期兴办，私营汽车运输业艰难发展，抗日战争时期畸型繁荣，抗日战争后短暂繁忙到最后日趋衰落难以为继的曲折历程。《云南公路运输史》第一册即以这个历史过程的史事为主要内容，上溯古代云南步驿道运输为其补充。

云南公路运输事业是在国民党政权的覆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后，才获得新生，得到振兴的。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云南公路运输获得较快的发展，一个与多种运输方式相互配合、相得益彰、辐射全省、外联邻省和周边国家的公路运输网络已经初步形成，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 第 一 篇

## 古代道路运输

（先秦时期至 1911 年）



# 第一章 先秦至隋代的云南古道运输

## 第一节 云南早期步驿道运输

(先秦至东汉)

### 一、春秋战国时期云南步道运输

《周书》中“伊尹朝献”记载伊尹奉商汤王令招四方贡品。产里、百濮等地便以珠玕、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来献。在“王会”篇中又记“卜人以丹砂为献”。有的史家特别是当代云南一些考古学家认为产里即车里在今西双版纳。“短狗”即今所谓哈叭狗为滇西特产。滇境有濮人亦称“卜人”。有的史学家持反对意见，认为这段记述并非滇境事。但所记献物，实为后来各朝云南寻常贡品。其中玳瑁、海龟、珠玕则是云南邻近海滨国家所产。经今滇境北运中原也是历来所常见。“菌鹤”或是因鹤有丹顶如菌得名。但有的认为是两物。云南盛产食用菌，此说也不是没有理由的。“丹砂”为赤铜矿。云南是产铜之地，云南考古发掘中铜器甚为丰富。可为《周书》所记作佐证。如1982年2月3日《云南日报》报导保山县八架山、观音山、大田坝白沙坡出土战国时代的兵器铜剑、铜钺等，还有铜鼓、铜釜，数量甚多。早于此的商代以铜矿为贡品，就不足为奇了。

1988年初，云南考古工作者在滇西北中甸县尼西区幸福乡发

掘 43 座石棺墓，出土了一批随葬铜器、陶器，其中有海贝、绿松石珠。这些只能产于缅印并经滇西入云南。其历史年代约在公元前 770 年至公元前 475 年之间，证明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带与缅印之间就有来往。祥云大波那，楚雄万家坝有春秋中期的古墓葬，为青铜文化的典型代表。其中也有玉石和珠宝。这些可以与《周书》所写史事互为参证。

祥云大波那出土 100 多件青铜器，尤为令人惊叹的是一副铜棺重 275 公斤由 7 块铜板套装而成，每块铜板为一次铸成。这是春秋中期云南古代冶铸技术与规模的见证，同时，也是当时古代云南人运输能力的证明。能铸成这种铜锡合金大件，采矿、冶炼和铸造，都是以燃料原料的大规模运输活动作为前提条件。

战国末期楚国庄眈率大军溯长江而上，经且兰（今贵州福泉一带）牂牁江（今北盘江）灭夜郎国（今黔西滇东一带）而后进入滇池，变服随俗，称王于滇。这是古代楚滇之间的一次大规模军事运输和移民运输的记载。

以贝为货币，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四川广汉县商代墓葬，宝兴、汉源汉代墓葬都有出土海贝。云南多处汉墓中也出土大量海贝，晋宁石寨山等地战国至汉代古墓中出土铜贮贝器、铜鼓，有的其中装盛着贝币。四川广汉三星堆和南兴镇商代遗址中出土了象牙、玉器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金缕玉衣、料珠、贝、玉、象牙，证明古代自云南通往缅甸印度的交通源远流长，因为这类物品有的只能产于缅印等滨海国。玉与象云南也有出产。这些考古成果，既是古代物资运输的事例，同时也是物资运输为载体的文化交流。

1978 年 11 月，牟定县新甸土龙村发掘出战国铜编钟 6 件 与以往祥云县大波那、晋宁县石寨山、广西省贵县罗泊湾、西林县普驮和湖北省曾侯乙墓、浙川下寺等处发现的战国至汉代编钟，都有相似之处。铜鼓之乡在云南 云南铜鼓与川、黔、桂诸省及越南所发

现的铜鼓也颇多共同之点。这无疑是在运输中传播的结果，或者是此地所制传入彼地，或者是在长期交往中互相影响、依样仿制。

## 二、秦汉时期云南步驿道运输

战国时期，七雄争霸，秦占汉中、巴、蜀，凭借天府之地，农工商业得到发展，今川东、滇北的“僰僮”即夷族先民充当的奴隶，川西南和滇西北的牦牛、笮马（朱提，昭通）堂郎（会泽东川一带）的银、铜、铁大量运入巴蜀。秦并六国后，派常頌略通五尺道，在今滇东一带置吏设治，更便于以滇东财富劳力资源促进巴蜀冶铸业与贸易的发展。

史学界对“五尺道”说法不一，主要有两种解释。其一说是指栈道，因地势陡险，路宽仅五尺。另一说认为“道”是少数民族地区古代相当于县的行政设置，其治所地名也称为某某道。于是，《括地考》中关于“五尺道在郎州”的记述，相应地也有两种解释，一说是五尺道起于僰道（今四川宜宾市西南）迄于郎州（又名味县，今曲靖），持此说的古籍，对中经线段都未作说明。另一说则认为是指“五尺道”的治所在郎州。两种说法各有所据，但无论谁是谁非，都可作为秦经营云南，发展交通运输的证明。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秦时还在今川西南滇西北一带置郡县。

秦亡汉兴，统治者暂时无力南顾。但巴蜀商人却继续从其东南与西南取得朱提矿产、牛、马与僰僮，有的南下，与粤商往返于今北盘江和桐师（今保山一带）之间，进行贸易。

私商贸易刺激着官商贸易的发展。官府想占有物资，便从发展交通入手。大将唐蒙受汉王朝命令前往番禺（今广州）招抚南粤。粤王请他吃了蒟酱，并告知是蜀商带入粤地，又知商人从番禺西至桐师，中经夜郎（古国名，在黔西滇东），唐蒙回告武帝，并报经准许，用巴蜀兵数千人、运输辎重的人众万余，修筑僰道到夜郎的南夷道（又称夜郎道），历时二年，而道路未修通，费钱很多，兵民苦痛难

堪 或逃亡 或反抗 工程半途而废。

司马相如建议停修南夷道，改修西夷道，即今四川成都经西昌、盐源、自宁蒍入云南通洱海地区一线。秦时曾置过郡县 路北南夷道较易修通。相如用雄辩的说理，加上巴蜀丰富的财物，诱使沿线部族首领支持，使西夷道修通，并从川滇西部运出了牛马 30 余万头。他的成功与唐蒙的失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得到汉王朝赏识。

元狩元年（公元前 122 年）汉武帝派使臣张骞去西域 到大夏（今阿富汗）见邛竹杖、蜀布 问从何而来 大夏国人说是商人去身毒（印度）买来。张骞推知身毒去蜀不远。从长安去大夏 若经蜀而南行，比经西北羌人区域南行更为直捷，汉武帝便于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令张骞派四路使臣十余人自蜀南入滇池。滇王尝羌协助他们向西求通身毒道。未料都被洱海地区的昆明部族阻拦。

元封元年（公元前 110 年）郎中司马迁奉命西征巴蜀 南略邛、笮（今西昌、雅安、汉源一带）及昆明（今大理），次年 汉王朝派郭昌发兵临滇池 使滇王归顺 以今晋宁为郡治 置益州郡 赐滇王金印（后从晋宁石寨山发掘出土）

其后，汉王朝，置不韦县于今保山县北，开博南道（又称永昌道 在今永平保山间）其地物产丰富 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记载，有铜、铁、铅、锡、金、银、光珠（宝石）、琥珀、水精琉璃、海贝、蚌珠（珍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貊兽。这些历来是向中原王朝贡献的珍物，也是商人采购转售的重要商品。此外有麴氐、帛叠、阑干细布、有梧桐木花织以为布。同书《郡国志》“记益州郡滇池出铁 俞元（今澄江）装山（湖中孤山）出铜 律戛（今弥勒县竹园）石宝山出锡 桐町山出银铅 赅古（今蒙自县新安所）采山出铜锡 羊山出银铅，双柏出银。

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 69 年）汉王朝在今保山设置永昌郡，重修永昌道。永昌便成为蜀身毒道中商业与运输的重要枢纽。以

致揆 缅甸北部 身毒的商人也常来往于此地。永昌一带以“土珍”“方物”作贡品 汉皇亦给予赏赐。

东汉时期的云南“朝贡”与接受“赏赐”已较为频繁地进行。这是古代中国商品交换和运输活动的一种特殊形态。永元六年（公元 94 年）敦忍乙王慕延慕义遣使译献犀牛、大象。九年（公元 97 年）……掸国王雍由调遣重译奉献其国珍宝，和帝赐金印紫绶，小君长都赐予印、绶、钱、帛。永初元年（公元 107 年）陆类等部族内附献象、水牛及当地特产封牛。

这个时期有关军事行动的记载稍详。如建初二年（公元 77 年）春 邪龙县（今巍山县境）昆明部族卤承等 应肃宗召募 镇压哀牢王类牢。皇朝赐卤承帛万匹 并封侯。建武十九年（公元 42 年）武威将军刘尚镇压栋蚕为首的滇池、叶榆（大理）弄椽 姚安北 诸部起义。斩杀数千人，得马 3000 匹 牛羊 30000 余头。元初五年（公元 118 年）封离率部族起义 次年永昌、益州、蜀郡 20 多个县响应 益州刺史张乔遣杨竦至叶榆等地镇压 斩俘数万 得资财 4000 余万 封离等降。

汉代云南运输史料在文献记载中难以得知其详。但逐渐增多的地下发掘物，可补文献之不足。

民国时期昭通发现多件铭文的堂狼和朱提铜洗。1965 年后又发现一洗 铭文“建初元年堂狼造”（当公元 76 年）为迄今所知铭文最早年代。近年，禄丰县金山砖瓦厂出土东汉永初二年（公元 108 年）堂狼洗一件，可见，东汉时期今会泽、巧家一带出产的铜洗 已运销于滇境各地。

朱提产银 王莽用以铸币 凡 8 两 值钱 1580 其他银 8 两 只值钱 1000。朱提银已于汉代作为朝廷铸币的上品。汪宁生认为“至迟从王莽时期起，朱提地区就是朝廷铸造货币的地方”。解送钱币的运输也已开始，东川禄茂区王碑地于 1987 年发掘出王莽时期的货币可为佐证。

朱提在西汉时置县，东汉建安十九年（公元 214 年）置郡。堂狼 西汉置县 治所在今巧家县 因产铜、铁、银等矿 汉代与四川运输往来较为频繁。

### 三、先秦至东汉时期云南重要运输工具

云南步、驿道运输早期使用的运输工具 见于出土青铜器雕塑与纹饰中，除水运的船只形像比较多外，筐、篓的塑型与刻纹图像也很多 有头顶的、额顶系带与背部负篓型的、肩挎系带型的。从图像中可以看出这些用竹篾或藤条编织的运输工具，制作甚为精美。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青铜贮贝器中，有一件盖上雕塑将人处死的场面 围观者众 有妇女多人 或手持篮 或头顶筐 在人群中穿行出售篮筐中物品。另一件容器外侧有刻纹画，绘一群人头顶或肩扛背负筐篓运粮，有的正倒粮入仓。筐、篓云南古已有之。

云南出现肩舆的历史至迟应在西汉。有一汉代贮贝器 盖上有四人抬肩舆，中坐老年妇女立体雕塑。肩舆构造很简单，仅是一方桶 无盖 前后两壁各穿两孔 以等长的两根长杆穿在四孔内 两杆距离比成人肩稍窄，乘者坐方桶内，前后各两男子肩抬两杆。

另一贮贝器桶侧有镂刻阴纹图，中有二造型精致而奇特的肩舆，各由四人抬着。每一肩舆有抬杆两根，杆头用一根绳索两端分别系牢，绳中插一横担，抬轿的两人各以肩抬此横担，绳索中点至两杆距离与成人肩头至腹中相当，抬者便可用手扶持抬杆，保持平衡。

云南历来以产马著称。有关汉代的史籍中有“金马行空”滇池驹日行五百里等传说。云南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上有骑马人的塑雕形象。如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贮贝铜器盖上，有马立牛背、人骑马背的雕塑，一青铜长巩戈上有两人骑马，一奴随后的塑像。另一贮贝器盖上有古代战争场面的立体雕塑，中为骑马奔腾者。

张增祺在《古代云南骑马民族及其相关问题》一文中，认为云

南驯马出现的时代，大致在公元前 11 世纪前后，即青铜器时代早期。约为公元前 5 世纪的德钦永芝石棺墓发现有马饰铜器，德钦纳古更早的石棺墓中也发现马饰铜器。由此断定，云南最早出现骑马民族的时代在公元前 5 世纪。晋宁石寨山还出土马嚼口铁、颈下铃及串金属圆片马饰，其时代当比上述出土物晚。

先秦至东汉时期云南的运输工具以后一直延续使用，只是型制有所改变，有的则至今仍保持古时的形状。其中篮、篓、筐、箩仍是山区农村日常生活和生产中常用的运输工具。

#### 四、云南早期交通对文化传播的影响

与交通运输相随而来的是云南与域外各省及毗邻诸国之间古代文化交流与融合。东汉时期堂狼铸币，广泛流传于西南，陕西出土也不少，这种货币是通过王朝发行与商贾交易两个渠道流传的。

1987 年春，在保山市西北龙溪山东麓龙王塘溶岩洞外清理出东汉时代的大型建筑遗址，并出土了大量多种图形的纹饰砖，而其 6 种纹饰中竟有菱形、硕叶、芒穗三类五铢钱纹饰，且以芒穗五铢钱饰纹砖数量为最多。证明西汉末、东汉初，永昌（今保山）及滇西一带广泛使用五铢钱。

司马相如通西夷道，司马迁涉足邛笮昆明，都曾经在所到之处讲学。叶榆的盛览、张叔即从学于相如。滇池地区的许叔，东汉元年间（公元 84—86 年）入中原，学习五经，归回云南后传授乡人。

《渡兰沧歌》写道：“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兰津。渡兰沧，为他人。”这首歌谣的时代历来说法不一，或说为西汉武帝时，或说为东汉永平时。但总是云南见于记载的最早诗作，且是关于云南交通的诗歌。《水经注》和《华阳国志》录有《燹道谣》则更是汉晋时期云南北部步驿道行旅艰难的生动写照。辞为：“犹溪赤木（两河名），盘蛇七曲（一说曲折意，一说为水名），盘羊乌椹（山名），气与天通。看都茶泚（行者流汗状），拄柱呼伊（停住手杖呼唤同伴）；床降贾子

(庾隆,今曲靖)左担七里,左肩挑担,七里不换肩)”。

东汉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滇上缅甸国王雍由调派使者到洛阳访问,带魔术杂技团表演绝技。而艺人自称是大秦(东罗马帝国)人。这是欧洲由滇川缅甸故道远去东汉王朝的文化交流壮举。

## 第二节 统一与割据交替状态下的云南驿运

(魏晋至隋)

### 一、蜀汉时期的云南驿运

东汉末年,群雄割据,以强并弱,形成三国鼎立局面。魏据中原,吴霸江东,蜀占四川,刘备以汉皇同姓,自命正宗,史称蜀汉。其时,云南、贵州及川南合称“南中”,属蜀国地域,实际上被大姓豪门控制。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吴国武昌太守诱使滇池大姓雍闿遥附吴国,并向吴进贡香料、细葛,“动辄千数”,明珠、海贝、琉璃、翡翠、玳瑁、犀、象、蕉、椰、龙眼,年年不断。贡马数百匹成队。

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四月,蜀主刘备卒,子禅继位,南中大姓公开叛蜀。雍闿杀益州郡治在今晋城太守,又将继任太守捉送吴国。今滇川西部的越嵩王高定元(或名高定)牂牁太守朱褒均响应雍闿。三股势力联合反蜀拥吴,实际上是远交近攻,吴与蜀都无法控制,南中便继续封闭在地方大姓割据之下。东汉初期一度繁盛的蜀滇掸身毒交通,此时不可畅通。

蜀汉政权与吴和好,又奖励农耕,与民休息。诸葛亮以“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力图劝诱南中归顺,以重开南部交通。雍闿等傲然拒绝。在近两年的等待与准备之后,建兴三年(公元225年)春,诸葛亮率军三路征讨南中。马忠一路入牂

牂 俞元(今澄江)人李恢入建宁(曲靖)诸葛亮自安上(四川新市镇)去越巂(西昌等地)会无(会理)五月渡沱(金沙江)入益州郡。雍闿被高定的部曲(农奴兼兵丁)杀朱褒、高定又先后被蜀军杀。继雍闿为帅的孟获,被诸葛亮七擒七纵感化而归顺。蜀汉三路军队合会于滇池,南中平定。年底,诸葛亮率军返回成都。是为云南历史上运路很长、规模巨大的军事运输。

蜀汉以归顺的大姓治理南中,在建宁设庾降都督府统领南中。“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这是较早见于史籍的大规模移民运输之一。《三国志·蜀志》记南中“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除了物资外,“叟、濮”是汉代就由蜀商廉价购买的奴隶劳动力,此时为蜀汉政权作赋贡征用。史籍中“南中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诸葛亮《出师表》中“南中已定兵甲已足”等记述都说明蜀汉从南中运入的财物对其政权的巩固与军力的增长有着重要的作用。

诸葛亮虽声言“不留兵不运粮”以当地豪强治理南中,“纪纲粗定,夷汉粗安”。但地方以贡赋形式而运送蜀国的财物甚多。谯周曾指出“南方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自丞相亮南征,……是后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以为愁怨”。他说诸葛亮是“患国之人”。蜀汉军队北还之后,南中多次出现叛蜀动乱。后以马忠任庾降都督,“恩威并用”重视和抚,动乱才平息。

汉嘉郡(治今四川名山县北)旄牛(汉源南)部族首领狼路感服于越巂太守张嶷,协力修通了旄牛至成都废绝百年的古道,恢复重建旧驿亭。这条联接滇川西部的旄牛古道,为蜀汉运送贡赋。狼路因功受封为旄牛胛毗王。

根据史实的分析,诸葛亮进军南中,并未深入洱海地区,但其影响在滇西甚为深广。雍闿联吴反蜀时,曾经被吴国委为永昌郡太守并派兵自东北两面围逼永昌。永昌功曹吕凯、府丞王伉前后十余年与蜀国无交通往来但固守拒雍拥护蜀汉。吕凯是吕不韦

裔，不韦县人，这个县是汉武帝时张扬其祖先恶名而命名的。吕凯为了争取群众，便打诸葛亮的旗号，得以立足于这个当官可以富足十代的宝藏之地。其域内交通及南下缅甸是不受限制的。而诸葛亮的名望同吕凯的影响也相得益彰。《旧唐书》卷 197 说“六诏”蜀时诸葛亮所征”。滇西缅北有关诸葛亮的传说与纪念性遗址遗物很多，不少收录在史籍和明清地方志中。

蜀汉平定南中后 永昌产物也北运蜀地 左思《蜀都赋》中写有“异物崛诡 奇于八方 布有橿华 麦有桄榔……”之句 说明永昌物产的橿华布、桄榔麦，已进入成都市场。

《华阳国志》中记载：“李恢迁濮民数千 落于云南 治在今祥云 建宁 今曲靖 界以实二郡”。这是官府强制实行的由滇西南向滇中、滇东的移民。

## 二、两晋南北朝的云南驿运

两晋南北朝云南虽历设宁州、南宁州(郡)太守、刺史、南夷校尉等官，但实际控制全境命脉的仍是方土大姓豪门。宁州以南的交州，历届王朝更是鞭长莫及，交州常由宁州命官兼管。霍姓自东汉至东晋就有弋、承嗣二人做过交宁二州刺史或太守，其后爨氏亦有同样情况。在汉代云南通安南道已是“转输通利，盖兵车资运所由”(《水经注》)。交宁二州交通在晋代也较被重视。光熙元年(公元 306 年)南夷校尉李毅死 子钊从洛阳还 因牂牁动乱受阻 乃停住交州，多年才回宁州。证明其时宁州去中原自交州绕道而行。此前 泰始元年(公元 264 年)霍弋派建宁大姓率部去交趾 占交趾等四郡七年，被吴国交州太守陶璜打败。陶璜降晋，向王朝极言二州关系之重大 称“水陆并通 互相维卫”。

1971 年发现于曲靖陆良的东晋“爨龙骧碑” 1978 年出土于曲靖市郊的东晋义熙元年(公元 405 年)所立“爨宝子碑” 南朝宋大明二年(公元 458 年)所立“爨龙颜碑”是饮誉海内外的瑰宝 也是

古代交通的实物证明。爨龙颜碑中记载了爨氏祖先“耀辉西岳，霸王郢楚”“蝉脱河东 逍遥中原”“迁运庸蜀 流薄南入”的身世。说明以爨氏为代表的南中大姓 有自中原 经郢楚、历巴蜀 然后入云南的。南朝宋元嘉九年（公元 432 年 益州赵广率众起义 宁州 曲靖 人民响应 龙颜前往镇压。晋时爨氏雄居大姓首位 自此独领风骚 至唐代被南诏击败后 才退出云南政治舞台。

《晋书·舆服志》记载：“魏晋重轺车（一马拉的轻车）而贱輜辇（二马或多马拉的大型马车）”。爨龙颜受命为龙骧将军与太守时“轺车钺斧 金章紫绶”好一派热闹景象。可见 其时建宁豪门已有轺车。昭通白泥井晋墓中的画相砖中有车轮、轺车图像。有人据此认为汉晋时期朱提或已有轺车。对此看法有人则持否定态度。

三国至晋代以来，云南运输上最有价值的事是朱提堂狼制成铜镍合金—白铜 并传销到国外。而镍的提炼成功 比欧洲早千多年。惜具体的运量运路等尚无史料。

晋武帝太康三、五年（公元 282—284 年）之间 罢宁州 设置南夷校尉，统领南中，令各民族贡献财物至南夷府（仍设治于今曲靖）纳牛、马、金、毡 动辄以万计。

晋代全国纷乱，云南豪门争霸，大批贫苦人民卖身为部曲。李毅作南夷校尉时 连年饥疫 死者十万计。光熙元年（公元 306 年）李毅死时，宁州粮食已尽，人们用柴草烤炙老鼠来活命。李雄政权鼓动南中暴动 攻下宁州 杀壮士三千人 送妇女千口去成都。后晋遣王逊征宁州，俘千计，数千村落遭蹂躏。成国李寿南征，占领云南 初“威禁甚肃”后又转为掠民。宁州步道驿道 成了晋王朝同地方大姓征战的军事路线，王朝与大姓豪门掠取各族人民财物的运输线。到南朝时期，爨氏胜于诸姓而独领风骚。南中与混乱的中原相比 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爨宝子碑中有“宁抚氓庶 物物所得”之句。意即人民得到安抚 事事物物各得其所。但是 梁大同三年（公元 537 年）武陵王纪为益州都督，建宁越嵩贡献方物十倍于前人。

这是近水楼台，捷足先登。未久，梁政权就放弃对南中的控制。因此到北周在宁州设有刺史实权却在爨氏手中。每年向北周贡赋仅几十匹马。云南盐泉，听民煎煮，在南中运销。两晋南北朝云南对境外运输日趋减少。

南亚与中国王朝仍有交往，多避开大姓控制下的云南运路。大夏阿富汗生产的香料苏合渣由商人辗转曲折而运到中国香味都大减了。东晋义熙（公元405—419年）初，师子国（今斯里兰卡）遣使向东晋王朝献玉像，经历十年才到达。

中原荆楚巴蜀汉人相继流入南中，对文化的交汇和民族融合起了很大的作用。昭通东汉孟孝琚碑、晋代爨宝子碑、南朝爨龙颜碑文辞充满汉晋风骨。孟孝琚少时读过《孝经》、《韩诗》。晋人常璩所著《华阳国志》关于朱提郡的记载中说：“其民好学”，号多人士，为宁州冠冕”。这是汉晋移民带来的影响。

范文澜认为，三国时期诸葛亮实行来去任便，彼此不相干涉的“羁縻政策”，不利于落后民族的发展；反之如南朝梁末梁统治者退出云南，州县全为豪酋占据，也不利于各族民众，因为在州县恢复豪酋统治增强落后势力是一个退步”。

最突出的例证莫过于东晋末及刘宋时期永昌郡的衰落。先是吕凯孙（吕祥子）于元康末（公元299年）承袭永昌太守东晋时为避濮人动乱乃向西南迁移到永寿县（今耿马傣族自治县境）郡治随迁。后郡被废置。东汉至西晋时蜀滇身毒故道上的要冲，三国时因抗拒雍闾并受诸葛亮褒奖而著称的名郡永昌，至此处于境内部族分裂，对外封闭，寂然无声状态。南朝初宁州十五郡中竟无永昌郡之名。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我国史学著作成书较多的时期。两晋南北朝晋史著作有20多家著述均失传。西晋陈寿撰定的《三国志》和常璩的《华阳国志》都对南中史事作了详实记载列有专志。魏晋文学亦甚发达，对云南的影响则见于两晋至唐宋时期的墓碑和功德

碑文中。

### 三、隋代云南驿运

北朝经魏后为东西二魏及北齐、北周并立，齐灭于北周，南朝经宋、齐、梁、陈四朝更替。南北朝对峙，各自内部又派系林立，互相征伐。人民陷于痛苦深渊，平时种田，战时打仗为职的“部曲”，日益增多。北方民族因战乱而向南迁徙。南北朝的统治者都腐败奢靡，最后导致人民的反抗，有势力的达官军阀乘时起兵。

北周宣帝死，幼主静帝当政时，宣帝后父杨坚辅政，挟幼主而令天下。尉迟迥、王谦、司马消难三股讨杨势力一一被杨坚击败，杨坚又以镇压反叛为由，从静帝手中取得政权，以“帝禅让”名义，代周为帝，改朝为隋。杨坚为文帝，改纪年为开皇。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灭了陈国，实现了南北统一，建都长安。

在中国大部分地域陷入纷乱争斗的时候，边陲云南却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南朝各代更迭频繁，无暇向南伸展，甚至采取弃置态度，这对云南有利有弊。弊在使云南处于封闭状态，落后的地方势力控制云南，不能在经济文化上与中原得到更多的交流，取得更大的进步；利在使云南避免因卷入南北对垒争夺之中而蒙受大规模战争的破坏。

与云南相邻的益州，总管梁睿，在隋朝建立前夕即按捺不住向云南索取财富的迫切心情，多次向丞相（后为文帝）杨坚进献“略定南宁（指云南）”的良策。说：“南宁州汉世群犴之地……户口殷实，金宝富饶，二河（即洱海地区）有骏马、明珠、益、宁出盐井、犀牛”。又讲当时南宁州的形势，爨氏“窃据一方”，当地百姓“苦其苛政，思被皇风”。既然人民正期待着杨坚去统治，则“辟土服远，今正其时”，况且他手下平蜀士众也“不烦重兴师旅”，于是他“即请略定南宁”。其最直接的意旨是“自卢戎、今泸县、宜宾一带，以来军粮须给，过此即于蛮夷征税，以供兵马。其宁州、朱提、云南（指祥云、